

MAN YI NU ZUO JIA CONG SHU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关露啊 关露

丁言昭
编选

她唯有背着「汉奸」的黑锅，对谁也不能说明真相，咬着牙忍辱负重。她就像一只深夜万籁俱寂时，自己叫给自己听的鸟一样，能用真话交谈的只有她自己。只有逼真地扮演「汉奸」，是她安全的保证。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关露啊 关露

丁言昭
编选

她唯有背着「汉奸」的黑锅，对谁也不能说明真相，咬着牙忍辱负重。她就像一只深夜万籁俱寂时，自己叫给自己听的鸟一样，能用真话交谈的只有她自己。只有逼真地扮演「汉奸」
全的保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露啊关露/丁言昭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

(漫忆女作家丛书)

ISBN 7-02-003365-2

I. 关… II. 丁… III. 关露-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882 号

丛书策划:郭 娟
责任编辑:王 玉 梅
版式设计:刘 小 沁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周 小 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5.00 元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边天

——“漫忆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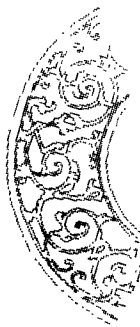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 and 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苏雪林、袁昌英——她们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



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它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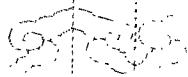
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它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



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





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一一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它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目
录

- 1 回忆我的姐姐关露 胡绣枫
- 22 关露在“孤岛” 萧阳
- 35 特殊的使命 萧阳
- 51 关露的编辑生涯 丁言昭
- 60 关露同志与《女声》 丁景唐
- 66 为了忘却的纪念 [日]岸阳子
- 83 关于《女声》的一些情况 丁景唐
-
- 86 悼关露 许幸之
- 93 悼关露 锡金
-
- 103 思忆关露 碧野
- 111 绵绵哀思几时尽 李纳
- 122 悄悄而去的关露 梅益
- 126 悼念关露同志 梅益
- 130 把一切献给了人民革命事业 徐鸿
- 135 风雨凄凉度此生 柳倩
- 141 “不许梅花不成雪” 刘朝兰
- 156 怀念女作家关露 陈锋
- 163 关露印象 沈凯
- 178 关露最后的日子 萧阳
- 184 悼念关露座谈会纪实 萧阳
-
- 194 一张关露的照片 周海婴
- 197 鼻子,鼻子 梅志





- 202 关露 石榆
204 一面之缘 萧耘
213 丁玲带我看望关露 王增如
219 悼念与追忆 炼虹
222 钟潜九致丁言昭 钟潜九

226 怀关露 许幸之
228 悼念关露姐 李剑华

- 229 评《太平洋上的歌声》 君平
233 关露和她的《新旧时代》 蒋玲玲
243 关露的《苹果园》 谭宗远
246 关露遗作 王禹时

附录一

- 251 我想起了“左联” 关露
257 春天里 关露

附录二

- 260 关露生平年表 丁言昭 编
268 关露著译系年目录 丁言昭 张伟 编

283 编后记 丁言昭





胡绣枫 回忆我的姐姐 关露

我的姐姐关露原名胡寿楣,这是我父亲给起的名字,因为我们这一辈排行是寿字辈,楣字的意思是取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之意。综观她革命的一生,虽谈不上有什么“壮门楣”之处,但也总还算对得起这个名字。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经常和几个进步青年接触如欧阳山、张天翼、钟潜九(中共党员、现在北京)、韩华恺(后名韩起,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可惜于抗日战争前病死)等,不久由欧阳山和张天翼办起了一个

刊物叫《幼稚周刊》，那时欧阳山用的笔名为罗西，关露也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她第一篇处女作《她的故乡》就是在《幼稚周刊》上发表的，这时她用的笔名是胡楣。1932年她参加左联后才开始用关露这个笔名。

她生于1907年6月16日（是阴历，以后她用阳历折算为7月14日，这我就不清楚了），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生地是山西省右玉县，祖籍则是河北省宣化县（当时属于延庆府）。父亲是满清时期的举人，一直在山西当个七品芝麻官。关露六岁时曾随外祖母到南京姨母家中住过三年，但在八岁时父亲就病逝了。父亲去世后，沉重的生活负担就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既要负担我们姐妹俩，还要负担外祖母。因父亲不肯贪污受贿，所以死后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我只记得当时母亲叫我把平时的一点压岁钱拿去凑着买了一口薄棺。

幸而母亲自幼勤奋好学，她毕业于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旅宁中学（解放前改为师范学校）。不但很会写古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小楷，还工于刺绣，这时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当时妇女出来工作是很少的），就靠到衙门里领了公文出来抄写（那时还没有打字机和刻印蜡纸之类，有些公文衙门人手不够，就拿出来叫别人抄写），这叫做写“白楷子”，是用上好的宣纸抄写，字迹不但要极端工整，而且是要写蝇头小楷，写这种字没有极好的书法和极好的眼力是不能写的。但给的报酬却很少，而且没有保证，不是经常能够领到的，所以经常还得用刺绣来贴补生活。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当当，有时连我的小衣服也在当铺里出入，所以我对于当票是很熟悉的，决不像《红楼梦》里面史湘云拾到邢岫烟当票，连黛玉也不认识那“是什么账篇”。

关露随着外祖母回到太原后，即进入小学读书，不久，母亲也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找到教师的工作，在两个学校教课，我们一



家四口的生活才算有了暂时的着落。

这时关露白天上学,晚上则由母亲自己教授古文古诗。不久母亲因身体过于劳累,就随着一位姓常的女友到湖南长沙乡下去养病,这时乡下有一个官宦人家,有几个女儿不愿请男老师(那时人们的思想极为封建)教书,就情愿走几里路到我母亲这里求学。这时的关露已经小学毕业,就完全在家由母亲教读些四书五经之类。

一 她开始爱好文学

关露就是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之下,读了些四书五经和古诗,并从此爱上了文学。她从小喜读书,不贪玩(当然那时家境贫穷,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不爱看闲书(那时小说之类一概被视为闲书),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写字,或学着作文、写旧体诗。她思路敏捷,不管作文或写诗,我还只开了头,她已经交卷了。(以后不管在哪一次大学考试中,她总是交头卷的。)但好景不长,不久,母亲便病倒了,病了两年之后,当关露还未满十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此时我们身在异乡(湖南),举目无亲,生活更无着落,只好跟着外祖母搬到长沙去住(因外祖母有一个表侄在长沙),在长沙时又在表舅父家中的一位家庭教师那里读了一年书,那位老师姓吕名雨湘,他是个满清时期的进士,但因不善钻营,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只好当家庭教师,这时他同情我们的遭遇,所以授课不收学费。但不久,因生活实在无着,只好又跟着外祖母来到南京和姨母一同居住。

姨母也是早年丧夫,又无子女,是个孤苦无依的人。她虽也读过书,但只能看旧小说,还不能在社会上找到职业。只能依靠祖上分下来的几间旧屋,除自住外,拿两间出租,每月收几元房



租,再加上给鞋店绣花(鞋上绣花),取得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每日借酒浇愁,一面喝酒,一面看小说,一面发牢骚,埋怨自己命苦,又埋怨外祖母没有给她找个好的富裕的婆家。

关露处在这样极困苦的环境,但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她牢牢记住母亲常常教导她的话,“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能够自谋生活,一定要学点本领,否则将一辈子受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入……”她孜孜不倦地求学,到处寻师访友,曾到青年会去补习英文,曾通过冯伊湄的介绍认识当时名画家梁公约先生,由于梁公约的帮助,曾免费进入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梁是美专的教授)。

二 冲出包办婚姻的牢笼



那时候,我们的外祖母和姨母的思想都很封建,认为女孩子惟一的出路就是结婚,找一个家道富裕的丈夫,就可以过一辈子幸福生活。她们之所以生活艰难,就是因命苦,丈夫早逝的缘故。因此,外祖母和姨母为我们日夜操心,不停地为我们俩找一个“好婆家”,也有那么多管闲事的亲友不时地上门来做媒,关露长于我,自然首当其冲。但她决不屈服,决不放弃自己的学业,决不屈从于这种包办婚姻。自己总想学有所成,能够自食其力时再谈这些。因此,为了这类的干扰,常常和外祖母、姨母发生矛盾,不管来谈的对象是什么人,关露一概拒绝。有一次,大姨母的儿子(即是表哥)为关露介绍了一个银行经理,总以为这下子关露该满意了,不料仍被关露一口回绝。这可惹恼了外祖母和姨母,认为关露不识抬举,不听老年人的教导,将来肯定要吃苦头,但关露仍不为所动,决定走自己的路。

过去所谈过的那位热心的吕雨湘老师写信来(因为我们一

直和这位吕老师保持通信联系),叫关露到河北怀安去当小学教师,我母亲那位姓常的女友一谈起关露要去怀安教书,她不大赞成,认为关露在学业上还没有多大成就,当教师也是不胜任的。这才打消了去怀安的打算。

1926年因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随母亲的女友到上海,遇见刘道衡同志(他是1932年入党,1969年被“四人帮”迫害去世),愿意全力资助关露进大学,随即进了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那时沈钧儒先生任教务长。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惨杀了国民党政府驻济南的特派员蔡公时,当时群情愤激,掀起了反日浪潮。法科大学自然也鼎沸起来,分队上街游行示威宣传,这时我们这一队由沈钧儒先生亲自带领,出去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关露这时第一次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不久,关露转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后又转到哲学系学习。

三 到上海参加革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竟在一夜之间强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反动政府则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使我国的大好河山,任人践踏。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卷起了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它席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也席卷了广大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的知识分子。

关露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革命。她和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位进步同学——钟潜九、韩华恺一同来到上海。钟潜九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后又到福特汽车公司当修理工,一身工人服装,满身油污,当时以一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当工人,是绝不仅仅有的。韩起开始帮助李剑华编辑《流火月刊》,1932年“一·二八”之后,该刊停办后不久,参加了左联。关露由钟潜九介绍认识





了在沪西搞工人运动的胡伊帆，参加了上海民众抗日反帝大同盟——简称民反——领导下的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简称“妇反”。从此关露就在“妇反”中工作，主要是在女工中间做宣传工作。

这时她常跟着一位女同志到沪西纺织厂、丝厂、美亚织绸厂向女工们做宣传工作，她在工人中办夜校，以夜校教员的身份深入工人群众，与女工们交朋友，组织姐妹团；有时组织读书班和诗歌小组。没有现成的课本，就自己编一些既适合于教工人识字、读书，又能宣传革命道理的教材。当时和女工们一起编写墙头诗，出壁报，写传单，举行诗歌朗诵会，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鼓舞她们参加革命斗争。解放后，有一位武汉大学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徐鸿，当时是一个花边厂的女工，参加诗歌小组的积极分子，就是在关露的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后来到延安去投奔革命，参加了党。这位徐鸿同志，1977年我在北京时还看见过她，她专门到我这里打听关露这许多年的遭遇，知道她还健在，仍居住在香山，去香山看望了关露。

关露就在这个时期入了党。除了积极做前面所说的那些工作外，还担任了“妇反”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我已参加了社联，她在党内的工作，我自不便多问，只看见她总是从早忙到深夜。

这时我们家住在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现名永嘉路）慎成里，她住拉都路（现名襄阳路），她几乎每天到我们家里来，和她联系的那位女同志经常如约到我们家里找她。她便换了衣服（当时我们都穿旗袍，女工们为了劳动方便，都是上身穿中式短衫，下身穿中式长裤，关露必须换了这套衣服才便于到女工中间去工作）。有时她叫我一道出去埋地雷，就是白天把墨汁瓶预先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晚上只要带上一支毛笔，就迅速地在附近的墙上写上“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